

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 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

SHIJI HANXUE LUNCONG

世界汉学论丛



曹天生 主编
张 琨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 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张琨等译. -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 - 101 - 04139 - 6

I .1… II .张… III .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846 号

-
- | | |
|-------|--|
| 书 名 | 19 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
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 |
| 丛 书 名 | 世界汉学论丛 |
| 主 编 | 曹天生 |
| 译 者 | 张琨 何英玉 王滢波 |
| 责任编辑 | 王守青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 字数 491 千字 |
| 印 数 | 1 - 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 - 101 - 04139 - 6/K · 1723 |
| 定 价 | 48.00 元 |
-

前 言

为使读者更好地审读和利用本译作,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就本书外文资料的获得、翻译等相关情况做一介绍和交待。

一、翻译本作的缘起和经过

笔者主持编译本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是到园圃摘南瓜,同时又摘到一个冬瓜。译,首先要有外文资料。本书俄文资料的获得,起因于我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的研究。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一字子怀。安徽歙县人。清道光进士。道光年间曾任主事、员外郎和御史等职。咸丰三年(1853)与左都御史花沙纳议订试行官钞简要章程,旋擢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在任期间,提出发行可兑现银币和最高发行额的建议,因此受到朝廷的申斥,不久调任兵部左侍郎,后又任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同治四年(1865)病卒于家乡。王茂荫主张发行可兑现银币而受到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论述到“货币或商品”时提到了王茂荫的观点和主张。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资本论》中提到王茂荫呢?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德文原文

是：

Der Finanzmadarin Wan - mao - in liess sich breigehen, dem Sohn des Himmels ein Projekt zu unterbreiten, welches versteckt auf Verw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Reich Assignaten in konvertible Banks noten hinzielte. Im Bericht des Assignaten Komites vom April 1854 erhält er gehörig den Kopf gewaschen. Ob er auch die obligate Tracht Eambushiebs erhielt, wird nicht gemeldet. 'Das Komitee', lautet es am Schluss des Berichts, 'hat sein Projekt aufmerksam erwogen und findet dass alles in ihm auf den Vorteil der Kaufleute ausgeht und nichts für die Krone vorteilhaft ist'.

('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 Aus dem Russischen von Dr. K. Abel und F. A. Mecklenburg, Berlin 1858', Bd. I. S. 47 ff.)

这段话的中文见于人民出版社 1975 年中文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第 146 - 147 页上标序为(83)的注释所翻译过来的那段话：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 1854 年 4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 F·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54 页)

做学问要刨根问底。既然马克思是根据卡尔·阿伯尔博士和 F·阿·梅克伦堡的译作而提到王茂荫的,而卡尔·阿伯尔博士和 F·阿·梅克伦堡的译作又是根据俄文资料翻译而来,那么,俄文资料原文是怎样的呢?从 1992 年起,查阅这篇俄文资料的原文便成了我的一个自拟的任务。尽管不查阅也行,研究也可以根据二手资

料进行,但总觉得最好还是能见到原文。国内的许多地方,我都利用各种机会设法查阅过,惜均无所得,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得到该俄文原文。好在该俄文之有无并不太影响我对王茂荫这个人物的整体研究,所以我一边研究王茂荫,一边等待机会搜集和查阅那篇俄文。

老天不负有心人。时间到了1998年12月20日,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教研部副主任)与本部外语教研室主任李雪和俄文教员张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调研,设在该院的全军职称外语考试中心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交谈中,我得知时在该中心的焦云峰干事的爱人何英玉在俄罗斯普希金语言学院学习。经人介绍,何英玉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又被派往俄罗斯深造,作为中俄两院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因为都是军人,我就冒昧地提出让小何代查该俄文资料。小焦(以后我就这样称呼他了)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是晚就给小何发电子邮件。出差回院后不数日,我就收到了经小焦转来的(当时本单位尚不能上网)小何的信件,也接到小何从异国他乡打来的电话。以后,我又将查到的该俄文资料出处的线索和可能藏有该俄文的单位写信给小焦,由他代发电子邮件给小何。一天晚上,我接到小何来电,告诉我她数次到俄罗斯国内多家图书馆查找该文,最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查到刊载有关王茂荫材料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的经过。因当天临近图书馆工作人员下班,已经来不及复印,只能等下次再来复印,还告知,经她翻阅,该《集刊》的各篇文章的内容都很有价值,问我是否一起要,如果一起要,就一并复印寄来。我激动不已,连说:“好!好!”因为我早就知道这套书的价值,只是没想到小何为我的这件事这么上心。

到了 1999 年春天,我收到了何英玉辗转寄来的一个纸箱的材料,即全部《集刊》共数百页全文和其它相关资料。首先,我请张琨翻译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和《巴拉第 1858 年日记》初稿,我对所译材料进行了审核,然后写作并发表了《王茂荫是如何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刊于《新东方》1999 年第 5 期,与何英玉、张琨联名发表)、《巴拉第 1858 年日记》(刊于《近代史资料》1999 年总第 99 期,与张琨、何英玉联名发表)、《王茂荫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史实考》(刊于《徽学》2002 年总第 2 辑,与张琨联名发表)等文。后来,我请张琨浏览了全部书稿,要她将每篇大致的意思讲给我听,我为这部《集刊》的史学和史料价值而兴奋,产生了将全书翻译过来,介绍给我国读者和研究者的想法,而且相信这套书的翻译出版,一定会对我国学术界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于是,我决定组织力量翻译出版该书。

1999 年 9 月,何英玉在俄罗斯留学结束回国。2000 年 6 月,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我便主要以通信联络的方式,将这套俄文资料分交(寄)给何英玉、张琨、王滢波三位翻译。他们的工作、学习都很忙,但对翻译这套书的任务都很支持,于是他们便利用工作之余和节假日的时间进行翻译。我再三强调翻译的质量,他们三位都非常尽心。尤其是与我同部工作的张琨,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为了尽早完成任务,经常工作到深夜。因为我是学英语和日语的,原先并不知道张琨的翻译水平究竟如何。从她给我的译稿看来,文字是通顺的,事件表述是完整的,那篇刊于《近代史资料》总第 99 期的《巴拉第 1858 年日记》,我曾带到北京,找一位大学俄语教师把关,该老师认为译文准确,质量不错。这时,我才放心。后来我将此文携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请庄建平

先生审读,没想到庄先生浏览全文,又核查了译稿中几个关键地点和人物后,击掌说好,并表示要尽快在他当时担任主编的《近代史资料》上发表。这使我完全信任了张琨。

本来,全部译稿出来后,我想请何英玉统稿,我来负责定稿,但何英玉后来又做了博士后研究工作,同时还兼任了其它更加重要的工作,不能再有劳她分心。王滢波也于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初进单位,不能旁觊。所以,全书的统稿工作便落在了我和张琨身上。

为了做好统稿工作,我和张琨分工。我所做的工作是:利用笔者掌握的历史知识和理论,把握所译每篇材料的准确背景;查找搜集翻译该书所需要的参考书、背景资料;对所译内容反复研读,并结合史实、习俗、语言表达习惯等,对译文有疑问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等。张琨所做的工作是:负责对全部译稿与俄文原文反复对照,进行核译,做到字斟句酌。最后,我们又在一起对全部译稿进行润色,尽量向“信、达、雅”的要求靠拢。

二、巴拉第其人其事

本书《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是由论文和资料组成的,除附录《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外,各篇都译自《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由于《集刊》的主编者是巴拉第,这里就要着重介绍巴拉第其人和他主编《集刊》等的一些情况。

巴拉第,原名卡法罗夫^①。1817年9月17日出生于地处今俄罗斯鞑靼斯坦的契斯托波耳市。1838年由喀山神学院毕业,1839年自愿参加俄国第12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助祭,为此取法号,以后的所有著作均以巴拉第署名。1840年,巴拉第到达北京后,学习了汉语、蒙古语和藏语。1846年奉召回国担任13届传教团的领班。1847年,巴拉第回到圣彼得堡,当年选定了新的团员,其中大部分来自圣彼得堡神学院。1848年,巴拉第升任大司祭,为新组建的传教士团进行汉语培训,所用教材为比丘林编写出版的俄汉对照《三字经》。1849年9月27日,巴拉第领导的第13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到达北京,一直到1859年5月25日回国。1860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驻罗马大使馆教堂住持。1864年俄国政府又派他担任第15届来华传教士团的领班。1878年患病,获准经海路回国,是年12月6日死于途中的马赛。

巴拉第在中国长期居留,担任过两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领班。由于俄国传教士团承担着宗教、外交等多重使命,所以,巴拉第的在华活动一直同沙皇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着密切联系,他的汉学研究实际上只是在完成其政府指令后的次要行为。他第一次作为助祭来华时主要从事了佛教研究。第二次以传教士团领班身份来华所经历的10年,正值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422-433页对其人其事有过较详细的研究和介绍,为免读者翻检,这里主要依据该部分内容进行缩略介绍。还可参考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谭彼岸:《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载《岭南学报》1952年第12卷第1期)、蔡鸿生:《俄罗斯馆与〈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曹天生:《王茂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日)等著作和论文。

列强相继侵入中国,沙俄乘中国内乱外患之机,趁火打劫,逼迫中国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及《天津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 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利用外交手腕得到了西方通过武力才取得的在华特权。巴拉第在这次侵略活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广泛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武力侵夺和外交公使普提雅廷(1804—1883)狡诈的外交活动出谋划策,是沙俄侵华的得力帮凶。可以说,在这 10 年中,他几乎没有从事过像样的汉学研究。巴拉第第三次来华时,正是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年,俄国在华建立公使馆,东正教驻北京教士团的外交功能随之削弱,主要从事布道事业。在此期间,巴拉第主要编写了使他蜚声国际汉学界的汉俄大词典,同时对中国的各种宗教进行了研究。

尽管巴拉第在政治上具有极不光彩的一面,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也是不可否认的。要了解俄国的汉学研究乃至研究中俄文化关系史就不能越过巴拉第。巴拉第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第一,在研究中国宗教方面成果斐然。第一次来中国期间,巴拉第和学员戈爾斯基(1819—1847)以及后来成为俄国大汉学家的传教士团借调人员瓦西里耶夫共同沉迷于佛教研究,从汉语、蒙古语和藏语文献中翻译了大量佛教经籍。在第一次来华期间巴拉第总共阅读了汉文佛典 750 卷。1852 年,《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一卷中发表了他第一篇佛教译作——《佛陀传》,接着在第二卷中发表了《古代佛教历史概述》。另外一篇译自汉语的《丹珠儿》,名曰《金七十论》,共 120 页,没有发表,手稿现存莫斯科的外交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他还有一部名为《佛教诸神概况》的著作,但手稿至今下落不明。巴拉第的这些佛教译作说明他曾

经是一个严肃的佛教研究者,致力于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佛教产生的历史、佛祖的生平和业绩以及佛教的各种仪式。但后来,他彻底放弃了一度痴迷的佛教研究,从此再未回头。在 1846 年奉召回国前,他将自己所有的佛教译文手稿赠送给了同室好友瓦西里耶夫。

巴拉第在晚年又对中国的汉语伊斯兰教文献产生了兴趣,共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名为《中国的穆斯林》,1866 年发表在《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四集。另外一篇文章是《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教徒刘泽亮编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诠释》,1877 年发表于《俄罗斯地理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 17 卷。但是,巴拉第最为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著作当数《伊斯兰教汉文文选》,全书共 334 页,在曾任俄驻华使馆医生的贝勒士奈德(1833—1901)的帮助下,1887 年于圣彼得堡出版。这本书的手稿是由阿多拉茨基神父于巴拉第死后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档案中发现的。阿多拉茨基神父和阿拉伯学家罗森(1849—1908)为该书撰写了前言,回顾了这部书稿的历史并简要介绍了伊斯兰教文献,提到巴拉第利用了当时仅有的 30 本汉文伊斯兰教文献中的 25 本。

此外,巴拉第还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研究。1872 年在《东方文集》第一卷发表《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在撰写该文时,他不仅参考了西欧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利用了 29 种汉文书。但他仍然认为材料不足,无法就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第二,在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方面成就突出。巴拉第对蒙古历史的研究至今为历史学家们所看重。他研究的侧重点为蒙古的早期历史,即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史。特别是他对《元朝秘史》的翻

译和研究,使他成为俄国蒙古历史研究的大家。《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是蒙古史传文学作品,成书于1240年,原文不传,作者佚名。传世的汉文音译本系明代火原洁、马沙懿黑二人翻译。后来收入《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之中,得以保存流传。自明清以来,此书陆续刊印过多种版本。19世纪传入外国,先后被译为俄、德、日、法、土耳其、捷克等多种文字,各国学者所撰专著和论文,对这部中世纪游牧民族中罕见的古代典籍给予高度评价。1866年,巴拉第在《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四卷发表了他所翻译的《元朝秘史》,原文来自《永乐大典》。他的译文准确、文笔优美,作了660条注释,并撰有前言,介绍了《永乐大典》的成书历史。1934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将苏联科学院所藏的《元朝秘史》影印本赠给了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1934年发表的文章中对其进行了考证,断定此本是由巴拉第于1872年从北京得到并带回俄国的。

他的这部译作后来受到苏联学者的极大重视。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雅库鲍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谈到《元朝秘史》及这部历史文献对别列津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不想起巴拉第,巴拉第所翻译的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历史所起的作用。他继承了亚金甫·比丘林的传统,树立了科学工作的典范,其价值至今尚存。他的《元朝秘史》不是由他所不知的蒙古原文翻译而来,而是翻译自汉语的《元朝秘史》。”俄罗斯蒙古史专家们认为巴拉第翻译的《蒙古秘史》即使在1941年科津译自蒙古文的译本出版后依然不失其科学价值。他的译文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丰富了好几代历史学家的知识,与波斯(今伊朗)史学家拉希德丁(1247—1318)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历史典籍《通鉴纲目》共同成为俄国关于蒙古王朝起源研究的基本文献。

巴拉第的第二部蒙古学译作是译自《皇元圣武亲征录》的《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皇元圣武亲征录》又名《元亲征录》、《元圣武亲征录》、《圣武亲征录》，不著撰人姓氏。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叙述成吉思汗通过征战将蒙古诸部联合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而称大汗的历史。另一部分描写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对外征讨，主要是征金、南宋的历史。这是一部已经失传的蒙古文史籍，现仅有译自蒙语的汉语译本存世。据俄国汉学史研究专家斯卡奇科夫(1892—1964)研究，巴拉第翻译《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所依据的原稿《皇元圣武亲征录》原属于我国清朝史学家何秋涛，后者花10年时间进行研究，但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刊印。后来巴拉第从何秋涛处得到了这部书稿，翻译成俄语并加了注释。

巴拉第的第三部蒙古学译作是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部书记述邱处机应蒙古太祖成吉思汗之召，于太祖十五年至十九年(1220—1224)赴西域途中的见闻。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述邱处机西游经历，下卷述邱处机讲道及东归住持天长观事。卷前收录邱处机挚友孙锡所作《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卷后为附录，收成吉思汗致邱处机的诏书、圣旨，燕京行尚书省石抹公谨请邱处机住持天长观的奏疏，侍行门人十八弟子和蒙古护持四人之名录。《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邱处机及全真道的重要著述，也是我国13世纪上半叶一部重要的中西交通史文献。此书可与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对研究元史、西域史、地理、民俗等均有参考价值。在世界中世纪的地理游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国外除了巴拉第的俄译本外，还有法、英等语种译本。在译本前言中，巴拉第介绍了这本游记作品的成书历史。他所作的有150页之多的600条注释，反映了他对这部游记的研究心得。

巴拉第的另外一部蒙古学著作是《中国人张德辉在 13 世纪上半叶的蒙古游记》，发表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论丛》(3)1867 年第 9—10 卷上。

1869 年，俄国地理学会请求俄国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允许派遣巴拉第前往南乌苏里江地区进行民族学考察。他在那里一共呆了一年的时间，期间向俄国地理学会寄回了大量报告，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公报》1870 年第 6、7 卷上发表了《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书信)》。

第三，编写第一部大型汉俄辞典，获得极高评价。巴拉第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编写大部头的汉俄辞典，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he 去世前。可惜的是，他生前还未能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就因病客死马赛了，手稿留在了北京。辞典最后是由波波夫完成并出版的。波波夫，又称柏百福或茂陵，出生于库尔斯克传教士家庭，后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从瓦西里耶夫为师。1807 年毕业，被分配到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工作。1886 年起担任俄国驻北京总领事。他得到了巴拉第留在北京的辞典手稿，加以补充和完善，最后于 1888 年于北京同文馆出版了两卷本的《汉俄合璧韵编》。波波夫在前言中简要介绍了巴拉第的生平以及著作。这既是俄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正式出版的辞典之一，也是俄国在中国境内印刷的第一部大型汉俄辞典。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为在北京出版《汉俄合璧韵编》拨了专款。这部辞典在 19 世纪末就已闻名于世，成为包括西方汉学家在内的重要汉学研究工具书。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对巴拉第编写的词典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中国的词典也不能提供帮助时，卡氏的词典经常是‘最终的论据’”。

除上而外，1872 年，巴拉第在《东方文集》第一卷上发表了《14

世纪在中国的俄国俘虏》一文,介绍了元朝时期被蒙古大军从古罗斯掳到中国的俄罗斯人的情况,追述了中俄两国的最初交往。这篇文章是巴拉第阅读了《元史》后写成的。《元史·文宗本纪三》记载了俄国人的消息:“辛未,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这曾经令俄国学术界大为惊讶,并对我国史籍的价值深感钦佩。1894 年,《活的古代》杂志发表了巴拉第《14 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的俄国移民》一文。他写到:“总的来说,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不大防备俄国人。应该指出的是,两国不仅存在地理上的关系,而且也存在历史的联系,很久以前,俄罗斯的灵魂就在天朝帝国游荡……在令我们痛苦的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人的名字就已经出现。俄国和俄国人在蒙古统治时期的中国被称之为斡罗思、阿鲁思、斡罗斯,有时叫乌罗苏。”1902 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公报》第 38 卷上发表了巴拉第的文章《修士大司祭鲍乃迪评马可波罗的华北之行》。

第四,编辑《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在国际汉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巴拉第担任第十五届传教士团领班时,倡议、组织并编辑出版了《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全书共四卷 28 篇文章,由圣彼得堡军校部印刷厂印行。从笔者的眼光看来,编辑出版这部《集刊》是巴拉第一生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现将这四卷的篇目和作者介绍如下:

第一卷,1852 年出版,篇目和作者是:

满洲王朝的发祥和最初情况,戈尔斯基 (В. Горский);

中国清王朝始祖的出身和满洲民族名称的由来,戈尔斯基;

中国居民历史概述,扎哈罗夫 (И. Захаров);

中国人制造墨、香粉和胭脂的方法，戈什克维奇（И. Гошкевич）；

佛陀传记，修士辅祭（现为修士大司祭）巴拉第（О. Паладий）。

第二卷，1855 年出版，篇目和作者是：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扎哈罗夫；

古代佛教历史概述，修士辅祭（现任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中国的算盘，戈什克维奇；

中国佛教徒的戒律及传戒仪式，修士辅祭（现为修士大司祭）古里亚（О. Гурий）；

中国医学，医学博士塔塔林诺夫（А. Татаринов）；

中国与西藏交往史概述，修士辅祭伊拉里翁（О. Иларион）。

第三卷，1857 年出版，篇目和作（译）者是：

明朝灭亡时期北京大事记，赫拉波维茨基（М. Храповицкий）；

评中国制盐业（译自中文），译者序，已故修士司祭茨韦特科夫（П. Цветков）；

关于中国山药的培植，戈什克维奇；

“御稻米”或称“香稻米”（早熟作物），戈什克维奇；

试评中国手术中应用的止痛药和水疗法，塔塔林诺夫；

中国人关于长崎的笔记，已故修士司祭茨韦特科夫；

关于中国的基督教（译自中文），译者序，已故修士司祭茨韦特科夫；

7 世纪的景教碑,已故修士司祭茨韦特科夫;

中国人的家庭礼仪(译自中文),译者序,已故修士司祭茨韦特科夫;

天津和上海间的海上交通,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香港,戈什克维奇;

养蚕业(译自中文),译者序,戈什克维奇;

道教,已故修士司祭茨韦特科夫;

军机处关于纸币的奏折(译自中文),修士司祭叶弗拉姆皮(Е. Евлампий)。

第四卷,1866 年出版,篇目和作(译)者是:

关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古老传说(译自《元朝秘史》),译者序,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西游记(译自《长春真人西游记》),译者序,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中国的穆斯林,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将这四卷篇目内容加以分类,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论著(文),是为作者的研究性论文。一类为译作,译作有 7 篇,实际上这 7 篇是以译为主,并附带有一定的评议研究性。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译”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俄国学者的眼光,因为翻译的内容是经过严格选择的;“评”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作者的种种观点,具有更强的学术研究性。

这部集刊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第一本汉学连续出版物,所刊文章极具科学价值。1858 年,德国人卡尔·阿贝尔和阿梅克伦堡将前三卷译成德文,编成两卷,一卷为文章,另一卷为

插图,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

三、本书的构成和内容简介

我们虽将《集刊》四卷全部译出,但思考再三,还是决定先出版这本《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集刊》中有7篇内容主要是直接译自中文的,虽然在译者序、注释等中有译者的研究,但正文还是俄译文的。作为译文,我们只要找到俄译者所依据的中文原文,我们就可以不必再翻译俄文为中文,而只要直接看中文就可以了,因为,中译俄再准确,也没有中文原文可靠,所以,我们认为,俄译中,不如直录中文文献原文(如果中文文献原文实在找不到,才可以意译俄文为中文)。《集刊》7篇中除《军机处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较短外,其余正文篇幅均较长,加上译者序和注释等外,篇幅就更长。为了节省篇幅,除《军机处关于纸币的奏折》译出外,其余6篇暂不出版。既然已经不是《集刊》四卷的全译,就根据所译论著内容以《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为书名出版为佳。

二是《集刊》中大都有译者序、注释,有的译文是译中有评有论,带有研究探讨性、事实辩证性(且不作价值判断),即便是就俄译本身来说,也有不少误译的地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之进行较多的研究和阐释,以免有些地方以讹传讹,所以,我们拟在本书出版后,就余下的6篇译作做以下工作:

第一,按图索骥,将6篇俄译文的中文文献全部检出,将之对应俄译文部分录出,以形成俄译中的译文正文。然后将俄译文的其余部分全部译成中文,并指出俄译者误译的地方,尽量做出我们